

中國經學



ZHONGGUO JINGXUE

第九輯

GUANG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廣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主編◎彭 林

經學名家

唐文治經學研究

——20世紀前期朱子學視野下的經義詮釋與重構 ○鄧國光

經術與救國淑世

——唐文治與馬一浮 ○嚴壽澂

經學史論

從《夏小正》傳文體式推論其作者 ○虞萬里

東漢古學與許慎《五經異義》 ○徐興無

錢坫年譜 ○陳鴻森

高本漢的經籍研究 ○單周堯

日本經學

魏晉經書解釋所顯示之方向 ○[日]加賀榮治撰 童嶺譯

札記·資訊

禮無貂裘解 ○張德付

《牡丹亭》結構之《詩經》淵源 ○鄭子運

王引之《經義述聞·春秋左傳》辨正六則 ○郭鵬飛

楊天宇先生及其“三禮”學研究 ○戴龐海

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（2011.3，臺北）紀要

記 ○彭 林

中國經濟學

— 第九輯 —

主編◎彭林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本輯承香港城市大學鄧立光先生資助，謹此致謝。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中國經學．第9輯／彭林主編．—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12.1

ISBN 978-7-5495-1321-5

I. 中… II. 彭… III. 經學—研究—中國
IV. Z126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2012）第 009323 號
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（廣西桂林市中華路 22 號 郵政編碼：541001
網址：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）

出版人：何林夏

全國新華書店經銷

桂林日報印刷廠印刷

（廣西桂林市八桂路 2 號 郵政編碼：541001）

開本：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張：15.75 字數：250 千字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：0 001～1 200 冊 定價：45.00 圓

如發現印裝質量問題，影響閱讀，請與印刷廠聯繫調換。

編委會 (按姓氏筆劃排列)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|
| 池田秀三 |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|
| 林慶彰 | 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文哲所 |
| 夏長樸 | 臺灣大學中文系 |
| 陳鴻森 | 臺灣“中央研究院”史語所 |
| 野間文史 | 廣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 |
| 彭 林 | 清華大學歷史系 |
| 葉國良 | 臺灣大學中文系 |
| 單周堯 |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|
| 喬秀岩 | 北京大學歷史系 |
| 虞萬里 | 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所 |
| 趙伯雄 | 南開大學古籍所 |
| 鄧國光 | 澳門大學中文系 |

■主 編：彭 林

■執行編輯：顧 濤

目 录

■經學名家

唐文治經學研究	1	鄧國光
——20世紀前期朱子學視野下的經義詮釋與重構		
經術與救國淑世	41	嚴壽澂
——唐文治與馬一浮		

■經學史論

從《夏小正》傳文體式推論其作者	69	虞萬里
東漢古學與許慎《五經異義》	87	徐興無
錢坫年譜	109	陳鴻森
高本漢的經籍研究	167	單周堯

■日本經學

魏晉經書解釋所顯示之方向	203	[日]加賀榮治撰 童嶺譯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----------

■札記·資訊

禮無貂裘解	40	張德付
《牡丹亭》結構之《詩經》淵源	68	鄭子運
王引之《經義述聞·春秋左傳》辨正六則	219	郭鵬飛
楊天宇先生及其“三禮”學研究	229	戴龐海
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(2011.3,臺北)紀要	239	
編後記	242	彭 林

Contents

■ Classical studies masters

- On Classicstudies of Tang Wenzhi: rebuild and annotation of 20 Century's
Confucian Statecraft with Zhu Xi's philosophy TANG Kwok Kwong
- The Confucian Classics for Saving China and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
the World-the Cases of Tang Wenzhi(1865-1954) and Ma Yifu (1883-1967)
..... YAN Shoucheng

■ O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y of the Classics

- The inference on the author of *Xi Xiaozheng*(夏小正) from the writing style
..... YU Wanli
- The relation between Eastern Han Dynasty's Ancient Confucian Classics
Study and *Different Meanings of the Five Classics* by Xu Sheng XU Xingwu
- Achronology of Qian Dian's(錢坫) life and scholarship CHEN Hungsen
- Karlgrén's studies on Confucian Classics SIN Chowyi

■ Japanese study of the Classics

- The direction of Wei-Jin's Classics philosophy explanation
..... written by KAGA Eiji, translated by TONG Ling

■ Notes and Information

- No Clothes with sable's fur in ancient rituals: A brief explanation ZHANG Defu
- Peony Pavilion* structure originated from *the Book of Songs*: A brief explanation
..... ZHENG Ziyun
- A discussion of six entries in Wang Yinzhi's *Jingyi Shuwen Chunqiu Zuozhuan*
..... Kwok Pangfei
- Yang Tianyu and his studies of *Sanli*: Summary and review Dai Panghai

唐文治經學研究

——20 世紀前期朱子學視野下的經義詮釋與重構

鄧國光

內容提要 唐文治於推動近代經學貢獻極大，是民國時期尊經的典範。本文從四方面觀察唐先生經學的本質，概括民國時期新經學的特性。一、透過時代的學生態所受的衝擊，指出唐先生在晚清朱子學的義理基礎上觀照、疏理及傳揚經學，一本明體達用的立身要義，重新樹立士人經世的抱負，以對治西學的衝擊與全新的黨治政治型態。此屬外緣的研究。二、基於上述前提，分析唐先生“讀經救國”論思想進路，並指出其支配經義詮釋，顯示於鎔鈞一切舊學的優點，以重構明體達用的新經學。此屬內緣研究。據此內外兩脈以顯示唐先生《十三經讀本》之強調經學真面目的意義。三、分析《十三經讀本》治經的基本方式，即“經學家法”與“經學義理”，兩頭並進。“經學家法”屬歷史問題，唐先生強調本此以求經學真面目，避免過度推崇與盲目否定。“經學義理”從治心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出發，指出經世致用與明體達用的共通性，均在以關心民生疾苦為起點。四、說明唐先生的經學義理集中在《尚書》學，透過《洪範大義》重構以大公無私為精神核心的政治觀，而強調農業與護持水土的重要性。

關鍵詞 唐文治 讀經救國 經學義理 黨治 農政

前言：研究唐文治經學的思想史意義

民國肇建，政權詭移，呼應世界局勢的譎變。全新的政黨政治，以及西式學府的普設，外來異質的思想淺薄而凌亂地販進，各式各樣的主張充斥社會，激發起傳統學術的全盤反省與拷問，二千年來一直是學術主流的經學，面臨嚴峻考驗。承接晚清急遽的救亡圖強的時代思潮，^①學術思想狂烈湧動，翻起前無古人的波濤，席捲每一角落。傳

^① 王爾敏《清季知識分子的自覺》，《中國近代思想史論》，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81—139頁。

統與西方的意識衝突，未有甚於此時，成為思想史上前所未有的劇變時代。

20 世紀初中國政治上的關鍵改變，是以“政黨”為基礎的全新統治型態，取代了天子孤家一人的統治。面對着史無前例的政治體制的改變，以天下為己任的經學家，必然較其他人反應強烈。時移勢易，天下一人變成一群“黨人”，朝廷變成議會，經學運用於昔日政治的種種主張，足以左右大政，而今日全遭廢棄。經學自身的存在基礎已經動搖，傳統經學已經不成為學術主導。如何面對新的政治環境，挽救經學，是 20 世紀經學的難題。

亂極而思治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，況且為道術自負之士！國家和文化如何自保與往前？再不能紙上談兵，知識界必須本其社會良知，主領帶動傳統學術的反省和更生，對現狀提出整治及改良的正面建設方案，對未來提出強盛的圖景，而表現出導引政治及社會的發展的強烈欲望。其強烈的程度，與西方學術的湧入的猛烈成正比。自清嘉慶、道光期間泛漲的今文經學，求變求新，帶動了高昂的自救圖存的思潮。於大時代焦慮的情景中，即使漢學訓詁的文獻研究，也難免轉向經世的方向。^①

民國時期的經學，處於新舊交替的轉變時刻，透過西式大學或傳統書院的學術教育的建制，繼續以講學或著述的形式展示學術的關懷與追求，回應新的時代訴求。1911 年至 1949 年之間短短三十八年，經學不但未曾中斷，而且研治的範圍與深度，不亞以往任何朝代。於文化論戰過程中，更激發熾烈的維護傳統的意識，以挽救世道人心的道義自許，迸發獨清的時代哀音，顯示極強的悲劇性格，為過去的經學所不曾有。民國時代經學拼勁之強，絕不能輕視。

救亡意識之表現於民國時期的經學，突出在“救國運”與“救學統”的自覺。救學統顯示於尊孔讀經，救國運則顯示於極強烈的道德重整意識。二者結合，國魂斯復。^② 跟新文化運動的終極關懷，並行不悖。全面審視 20 世紀前期五十年的中國學術思想的流變，實在有必要客觀地理解經學的情況。

論民國時期的經學，更須正視學人主持和維繫的作用。其中長期在長江下游鼓吹經學救國的唐文治，其經學主張與成果，足以顯示這五十年經學自新運動的特點，對梳理民國學術至為重要。遺憾的是：唐文治的經學向來不在學術思想研究的視野，至今祇得一篇碩士論文討論。^③ 以唐文治研治經典的精與勤，以及創立“無錫國學專修學

① 羅檢秋《嘉慶以來漢學傳統的衍變與傳承》第二章《漢學走向經世致用》，北京：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，2006 年，第 154—259 頁。

② 鄭師渠《國粹、國學、國魂——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》第四章“國粹派的文化觀”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2 年，第 125—174 頁。

③ 張晶華《唐文治學術思想研究》，山東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06 年。

校”的倡導經學救亡和培養大量學術人材的努力，其貢獻顯然不能忽略。

本文以學術史的流變通觀唐文治的經學，顯示民國經學獨特的一面；突顯唐文治出於學人良知的讀經救國論，重整傳統主流學術的意願，展示經學與理學在 20 世紀融合的思想進路。見學術良知，未泯斯世。

拋磚引玉，以期經學獲得正面的關注。唯孤陋寡聞，綆短汲深，尚祈大雅不吝賜正。

一、唐文治行誼——從政與興學^①

唐文治(1865—1954)，字穎侯，號蔚芝，別號茹經，生於江蘇太倉市的瀏河。其父唐受祺，號若欽，恩貢生，以塾師維生，曾編輯明清之際太倉大儒陸世儀(1611—1672)的著作，成《桴亭先生遺書》。其母胡氏，通經史，母教甚嚴。唐文治自幼發奮向學，14 歲讀完《五經》，16 歲中秀才，18 歲(1882 年)省試中舉。於 17 歲受業於太倉儒者王祖畬，習理學。王氏以理學治《春秋》，^②長於制義，對唐文治日後的學術發展深具影響。通融經學與理學，是晚清主流學術的自身重整。唐文治深具這種通融的學術精神，服膺朱子之學，以朱子之學統攝王陽明心學，體用兼該。其治經的精神與日後提倡讀經，均刻意通融宋明儒學與漢唐經學。21 歲入江陰南菁書院，受業於經師黃以周與王先謙。曾協助王先謙校訂《續皇清經解》。唐文治學而優則仕，時有否泰，後則辦學救時，所以依其仕行與興學兩大類目綜述其行誼。

唐文治於 1882 年中舉後，分派戶部江西司主事。座師翁同龢極為賞識，稱許“學問、性情、品行，無一不佳”，而延聘於家塾。1894 年甲午之戰，上書軍機大臣翁同龢，因戰情的發展而呈上《邊務芻言》五書。第一篇諫直言國情事實於人君，令中樞充分了解大局以應變；第二篇力主重整東北防務，以衛北京；第三篇力主痛懲護國無方的高級將領；第四篇建議國內官員募集軍餉，避免騷擾商人與百姓，力言舉外債之弊；第五篇陳請當局堅定意志，嚴守內地，迅速反擊，規復朝鮮。同年並上萬言書《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折》，呼應康有為的維新主張。次年中、日《馬關條約》簽訂，康有為與江蘇舉人

① 唐文治行實，依據唐文治自撰《茹經先生自訂年譜》，《茹經堂文集》，臺北：中國文獻出版社影印本，1970 年；王桐蓀等選注《唐文治文選》，上海：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，2005 年。

② 《翁同龢日記》光緒十八年壬辰(1892)載：“王子祥(祖畬，散館改縣)來見。此人理學有《左傳質疑》、《春秋……》(按：原文如此)三十卷，尤長於制義。張季述推為江南第一也。”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3 年，第 5 冊 2549 頁。

汪曾武等人發動“公車上書”，唐文治代擬《上察院呈》文，力爭保存臺灣主權。1896年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，閱讀評點傳教士丁韋良譯的國際法著作《萬國公法》，以提高處理外交交涉的能力，但從此眼疾加劇。1898年2月，即戊戌變法的前三月，上《謹彈血誠以維國脈折》，提出政革救時的主張；並附呈《請停止搜括之政片》，呼籲停止一切向民間紳商小民盤剝的劣政。凡此皆顯示了知識分子發自良知的時代呼聲。

1898至99年間，任戶部雲南司正主稿，反覆討論並條陳整頓流通貨幣，主張自鑄銀圓，流通全國，取代銅錢和外國銀圓並用的混亂貨幣政策，於晚清商政建樹良多。1900年庚子義和團亂作，八國聯軍入京，唐文治留守北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偶與拳民面對質，既親歷極慘痛的屠殺場面，唐文治哀憫生民之心盡表無餘。作《記庚子六月冤獄》，記團禍的種種慘事；並作《記徐桐、崇綺事》，控訴邪臣借理學之名破壞洋務和新法，禍國殃民。唐文治因此特別注意真正的理學，其後的學術均不離理學“明體達用”的精神，皆誘發於時代的傷痛。

1901年9月，唐文治隨同戶部侍郎那桐赴日本道歉，代那桐撰寫《奉使日本國紀》，觀察出日本上下一心，專意於新學以維新，國運日隆；致慨於中國官員營私舞弊，乖違中朝的意旨，以致改革無效。1902年5月隨專使載振外訪歐、美，以參贊身份外訪，取道香港及新加坡，順道考察民情風俗，眼界大開；然後官式訪問法國和比利時，獲比利時國王授四星勳章；赴英國倫敦祝賀英王愛德華七世登基的儀式；橫渡大西洋，考察美國，觀察新大陸政、經、社會與文教，深為所動，而強調民主制度的優長。西渡太平洋回國，途經日本；在日本訪問考察，日皇授予四星勳章。唐文治此行環地球一周，見聞大增，其素來所抱政經更革的主張，得以與西方現狀對照，而更明確人心道德於現代社會的重要建設力量；於代載振撰寫《英軺日記》，以英、美、法、比、日五國政治、經濟、教育的狀況，強調中國自強重生的參借，皆在統治的心術；並強調嚮往美國國父華盛頓大公無私之情，此皆用意良苦的筆墨。

1903年代載振作《議復張振條陳商務折》，條列復興國家商務和金融制度，並建議效法香港錢幣鑄造統一的貨幣形態。1904年11月上《請設立商會折》力主設立商會，慈禧太后親詢釋疑而後允准，中國自始有商會的設立。自唐文治倡議建立商會之後，全國四十餘都市均設立了商會，為晚清及民初的政府融資及金融管理提供了極大的方便。唐文治是中國20世紀初重商主義的代表人物。1905年日俄戰爭之後，上《請飭東三省速舉要政折》凡十條，力陳先發制人以改革東三省的政治經濟，以免淪為日本的殖民地。同年七月復上《請設立勘礦總公司以保主權折》，力主立法制訂採礦的活動，而保持土地的自主權。1906年以農工商部左侍郎並署理尚書，上《議復北洋大臣、政務處，奏路務議員辦事章程不無窒礙折》，請各省設鐵路事務監察的路務議員，整頓

借公謀私之風，與直隸總督袁世凱不合。此後袁世凱當國，唐文治從此絕意仕途。是年代載振致函日本近衛篤磨，勸日人和中國禍福與共，並以《萬國公法》譴責日、俄兩國爭奪中國土地的失義，義正辭嚴。

1906年冬丁憂離京，守制南歸。載振也被參而離職，唐文治失去朝廷重臣的支持，種種建議，亦不能落實。例如甲午戰後，反對和議，堅持力保臺灣；辛丑和約之後，為建立商部躬力策劃和部署；日俄戰爭後，力陳消除滿漢的閼隔。凡所提出的興利救弊的建議，皆遭到抵制。政治上已無所作為，於是引退。南歸上海後，全力辦學，以“救民命、正人心”，鼓勵氣節，尋求恢復民族尊嚴之途。

唐文治從政之時，目睹時艱，深刻體會士風頹敗、民心散渙、氣節淪喪諸種痛疾；認為國運之頹是多方面的原因，而關鍵在為政者的道德品質，能否存公道去私心。改變士習，乃承弊起衰的要務。基於這種認識，唐文治極重視教育，期望透過師友的講習，砥礪道德，培養志尚，則民族的復興，並非遙不可及。唐文治主持學堂，逆抗時風而力倡經學，其活力淵源自這堅強的信念。

1906年8月唐文治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總監督，辛亥革命後改號南洋大學。於1913年改稱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，1921年正式定名為交通大學。在這十四年間，唐文治特設專業學科，專款購置設備和圖書，禮聘中外名師任教，同時遣送學生留學，提昇工業專科學校的性質，辦成中國第一所完整的理工科大學。唐文治全力打造一所新型大學，培養具備創新能力的優秀科技人才，足以自製汽船與飛機。唐文治堅持的道德意志主導行為世界的信念，所主持的交通大學雖主理工科目，但不廢德育、體育、國文和外語；甚至每週為學生親授國文，勵淬學生的意志。唐文治治事極勤，凡事親力親為，更嚴於律己，讀書甚勤。然其不善護目，早年攻讀《萬國公法》而耗損的視力，至此日差。1920年，唐文治56歲，完全失明，不能閱讀，為此而辭去交通大學校長的職務，回無錫休養。

在無錫期間，富商施肇曾（1867—1945）議設書院，力邀唐文治主持，遂成立“國學專修館”。1927年改名“國學專門學校”，一年後名“無錫國學專修學校”，自始定名，簡稱“國專”。唐文治以此延續明清書院的學術傳統，於主流的西式學校體制外，甦生被貶抑的傳統學術，發揚師友互相砥礪的精神，為傳統學術開闢生存和發展的空間。唐文治具豐富的管理現代工程學科學府的經驗，極深刻體會大學和書院的差異，運用兩種不同的育才機制，相輔相成，以培養振興國家的人才。

“國專”特重經學，唐文治親自編訂《十三經讀本》，及撰寫各經的“大義”，以作門徑。由於學術訓練嚴格，培養自發的研究能力，門下多成為日後中國人文學科之中獨當一面的學者，各以其深厚的學術力量，反過來主持現代大學的學術研究和傳授。

“國專”和北大、清華等大學的文科科系簡峙，成為中國大學文科的重要師資來源，學術影響之深遠自不待言。錢仲聯回憶“國專”的學習生活說：

唐文治辦國專，教學方式類似舊時的書院，主要講授五經、四書、宋明理學、桐城派古文、舊體詩，旁及《說文》、《通鑒》和先秦諸子。義理、詞章、考據，學生可以就性之所近偏重，漢、宋學兼采。^①

這是兼容並蓄，集傳統學術的大成，並因材施教，於是培育大批人才。其門人如陳柱、唐蘭、吳其昌、王遽常、錢仲聯、蔣天樞、湯志鈞等，乃獨當一面的學者，為中國現代學術的中流砥柱，即使學有專門，非關經學，但以“國專”的訓練，根深柢固，因而在不同的學術領域取得成就。

綜觀唐文治一生行實，親歷滿清、中華民國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，不論從政與辦學，俱以民族文化為意，一生光明磊落，是經師而兼人師。傳統學術的經世精神，得唐文治而傳揚。唐文治以經學為教，提倡讀經至為積極，在 30 年代，乃倡導讀經的大旗手。論民國時期經學，此極為關鍵。以民國初年手編《十三經讀本》並諸經“大義”，因文明道，其表現為一具道德和學術實效的力量，根本於淑世情懷而施用於世的熱情，而非徒以文獻研究為尚的文字工夫。其中深厚歷史意識與時代關懷，有異於“夷經為史”的經學史研究。故論民國期間的經學，不能繞過唐文治。

二、民國時期尊經論的強音——唐文治“讀經救國”論

“讀經”是民國時期爭論不休的問題，唐文治是積極的支持者，鼓吹“讀經救國”，提倡不遺餘力，其信念之堅定，歷經世變而毫不動搖，至耄老而越堅固。1947 年 7 月唐文治在交通大學演說，謂：

近世生民之困苦，奚啻孺子之入井？何以救之？有力者以經濟，無力者以學說。^②

唐文治概括對治及擺脫時代困境之塗，不出經濟與教育，這是經歷了 20 世紀上半葉所有的國難和浩劫之後的貞定。唐文治以“興養”一詞概括復甦國民經濟的舉措，而以“興教”一詞為學說救國的標誌。“有力”、“無力”，意指政治權力。擁有權力的人指

① 馬亞中主編《學海圖南錄：文學史家錢仲聯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0 年，第 7 頁。

② 唐文治《茹經堂文集六編》卷一；又王桐蔭等選注《唐文治文選》，第 512 頁。

當政者，運用政策復甦經濟是其當然的責任。無力者是唐文治這類在野學人，振興教育是其所當然的天職。朝野同心共力，各盡其責，才是復興的基礎。

唐文治強調朝野兩種力量共治天下，是典型的傳統“治統”、“道統”的理學觀念的投射。治統在養民。道統的責任在教民，維繫道義，保存社會的理性與良知。唐文治是以肩負道統為己任，道德感於是極其強烈，強調“興教”的效用，集中於“氣節”的自覺；以此自覺糾正“人心”，而其途徑，則以“讀經”入手。此唐文治的“讀經救國”論：

鄙人以爲方今最要者“氣節”二字，近撰聯語云“人生惟有廉節重，世界須憑氣骨撐”，若氣骨不應，如洪爐之溶化，非我徒也。然氣節要有本源，在拔本清源，非“讀經”不足以救國。要知經典所載，不外興養、興教兩大端。興養者何？“救民命”是也。興教者何？“正人心”是也。鄙人常兢兢以此六字為教育宗旨。^①

唐文治提倡讀經救國，提點“經典”的內容兩大價值指向：興養與興教。不論治統或道統，都須要從經典之中厚培“興”的精神力量，各自在政經、文教兩方面重新樹立清晰的道德觀，本此建設經濟與重建道德。經濟建設在於“救民命”，道德重建意在“正人心”，其精神資源俱源自經典。朝野齊心，身體力行，“讀經救國”，並非遙不可及的口號。唐文治強調：

切望以“讀經救國”一言，廣播而推衍之，則拯民命、正人心之道在是矣。或有笑我為迂者，可置之不理。^②

“讀經救國”論是唐文治貫徹終始的主張，透過辦學與講學的長期奮鬥，潛移默化，發揮積極的作用，進而影響政治的決策者。唐文治有自知之明，深知讀經的主張不合時宜，但身負道統，從長遠及根本處考慮，即使不諧於世俗，與時相違，亦在所不惜，堅持信念。

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的《教育雜誌》第25期，專題是“讀經問題專號”，選錄全國知名文科學人對讀經的正反面的意見。唐文治便是首列“絕對贊成者”。唐文治詳述“讀經救國”的宗旨和實踐方式，是民國時期主張讀經的重要宣言，為方便讀者免於翻檢之勞，實錄如下。

竊惟“讀經”當提倡久矣。往者英人朱爾典與吾華博士嚴幼陵相友善。嚴嘗以中國危亡為慮，朱曰：“中國決不至亡。”嚴詢其故，朱曰：“中國經書，皆寶典也。

① 《唐文治文選》，第512頁。

② 《唐文治文選》，第511頁。

發而讀之，深入人心，基隆扃固，豈有滅亡之理？”余謂朱說良然。

吾國經書，不獨可以固結民心，且可以涵養民性，和平民氣，啟發民智。故居今之世而欲救國，非“讀經”不可。

願“讀經”所以無統系者：一、程度淺深，較難支配；二、難得通達之教師；三、難得顯明易解之善本。以上三端，以得善本為尤要。蓋既得善本，教師即可循是以講授，主持教育者，即可循是以核定功課。譬諸行路然，可按圖而計程矣！

今擬自初級小學始，以至大學文科研究院，按照各經淺深緩急，分年支配，規定課本，附以說明，若能切實講貫，尚不甚難。

惟更有進者，“讀經”貴乎致用。而致用之方，必歸於躬行實踐。故凡講經者，必須令學生一一反諸於身，驗諸於心，養成高尚人格，庶可造就其德性才能，俾腦經清晰，氣質溫良，學道愛人，方有實用。

若徒務考據，驚訓詁，自命奧博，浮泛不切；或好立新義，亂名改作，非徒無益，而又害之矣。

至於實事求是之法，尤貴有恒。若試行一二年後，動輒更張，學生耳目淆雜，無所適從，亦決無成效也。

爰述管見，先定統系，再於說明中列方法如左：

（一）初級小學三年級應讀《孝經》。

孫文先生民族主義，謂《孝經》所講孝字，幾乎無所不包，無所不至云云。誠以《孝經》教愛敬之原，立養正之本也。今考其書，若一千九百零二字，當於初級小學三年級起讀之，分兩學期，務期熟誦。（經文及註語精要者概須熟讀，以下各經皆然）是書唐明皇註本，無甚精義。明黃石齋先生《孝經集傳》，又嫌太深；鄙人所編《孝經大義》亦嫌略深。惟須善講者譬況使淺，引證故事，開導學生良知良能，是為立德立品第一步根柢。

（二）高級小學三學年應讀《大學》及上半部《論語》。

（說明）孫文先生民族主義謂中國最有系統政治哲學，如《大學》所說格、致、修、齊、治、平，自內達外，推及於平天下，此等理論，外國哲學家所不能道云云。蓋《大學》之精微，膾炙人口久矣。至於《論語》一書，言學言仁言政，言孝弟忠信，言禮義廉恥，莫非修己治人之要。

今考《大學》共一千七百四十九字，《論語》自《學而》篇至《鄉黨》篇，共六千八百九十三字，於高級小學三年中支配之，可以一律熟誦。《大學》以朱子《章句》為主。明王陽明先生復古本，實與《禮記注疏》本同。鄙人所編《大學大義》，兼採鄭、朱二家注，亦可作課本。《論語》以朱子《集注》為主，鄙人所編《論語大義》，

貫串義理，亦可作課本。

或疑《大學》、《論語》皆政、教合一之書，初學讀之，似嫌躐等。此說誠然。但須知童年知識初開，正當以此等格言，俾之印入腦經，養成德性。若教慮其沉悶，可略舉史事以證之，自能引起趣味矣。

（三）初級中學三年應讀下半部《論語》及《詩經》選本。

（說明）自《先進》篇起至《堯曰》篇止，計共八千九百八十六字，定二學年必可畢業。或疑下半部《論語》有後人偽託之處。非也。鄙人嘗編《論語外篇》，已詳論之矣。

《詩經》溫柔敦厚，足以涵養性情，考見政治風俗。且有韻之文，易於誦讀。當以朱子《詩集傳》為主。但恐一年尚不能卒讀。鄙人嘗編《詩經大義》，共分八類，曰：倫理學、性情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、農事學、軍事學、義理學、修辭學，共選詩九十餘篇，每篇均有注釋並詩序、詩旨，可作課本。

（四）高級中學三學年應讀《孟子》及《左傳》選本。

（說明）《孟子》一書尊重民權。民貴君輕，用人取舍，壹順民之好惡，惟其嚴公私義利之辭，故其政見精覈若此。他如孝弟人倫之本，出處取與之經，察識擴充之幾，闢邪崇正之道，與夫不嗜殺諸學說，皆足為今世良藥。其書共三萬六千五百八十九字；當以朱子《集注》為主，附以鄙人所編《孟子大義》，於兩年中支配之。

至《左傳》為禮教大宗，旁逮外交等學，無所不備。惟卷帙繁多，短期中難以卒讀。鄙人有《左傳》選本，分八類，曰：禮教類、政治類、國際類、兵事類、諷諫類、文辭類、紀事類、小品類，可作課本，於一年內支配之，注解以杜林合注為善。

（五）專科以上各大學及研究應治專經之學。

（說明）凡通經宜就性之所近，專治一經。精通之後，再治他經，循序漸進，不能拘定年限。務宜研究“微言大義”，與涉獵章句者不同。其尤要者，實施之政治，推廣文化，致良人心風俗。如《禮記·經解》篇所謂“絜靜精微”為《易》教，“疏通知遠”為《書》教，“恭儉莊敬”為《禮》教諸端，纂言鉤玄，確得要領。他如《大戴禮記》、《國語》二書並宜精究。

鄙人所編《十三經提綱》、《周易消息大義》、《尚書大義》、《洪範大義》、《禮記大義》、《中庸大義》各書，均可藉以入門。此外博考羣籍，如《十三經註疏》、《古經解》、《小學彙函》、《通志堂經解》、《七經精義》、《皇清經解正續編》，及諸大儒經說，均宜分門參考。總之不尚新奇，不務隱僻，庶學有實用，蔚成通才矣。

以上所述是否有當，未敢自信。茲事體大，宜集思廣益。請中央政府並教育部採擇施行。鄙人默察近來世變，人心日尚欺詐，殺機循環不窮，倘不本孔、孟正

道以挽回之，竊恐世界劫運，靡所底止。深望海內賢豪相與講道論德，以期經明行修，正人心以拯民命，救中國以救世界。此鄙人馨香以祝之者也。^①

《教育雜誌》上刊出的論“讀經”諸文，在課程、教科書與學生能力的配合等的操作性考量，沒有比唐文治這篇來得周至具體。可知唐文治“讀經救國”論，不是一時的意興，實經過長期默察與生活磨練的結果。

唐文治不徒空論讀經的見解，而是推廣一套在現代學校體制實踐的授經方案，提供全國施行。唐文治設計這篇“讀經”的施教方案，規劃清晰。唐文治不嫌標榜而推介為“讀經”的用書，不離其在無錫“國專”刊印的《十三經讀本》的“善本”和親自撰寫的衆經“大義”。這都是其辭官南歸之後，耗十多年工夫蒐集的善本與研治心得。

唐文治提倡讀經的強烈信念，乃源自親歷；在風雨欲來之前，見出深藏時局中的“殺機”，這是極其敏銳的政治觀察力，體會到一股不祥的政治氣候。於是有盼民國政府施行“讀經”的方案，化解“殺機”。迷處當時，則“殺機”之論可能被視為危言聳聽。但反觀歷史的進程，則其默察世變而高瞻遠矚的智慧，的確出乎流俗，究非人云亦云的守舊迂腐所可擬於萬一。

唐文治“讀經救國”論並非抗拒現代文明，反對西方文化。唐文治從政期間，已經極注意西學，與康有為等維新學人相呼應；任職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精讀《萬國公法》，以處理涉外事宜；創辦商部，大力推動金融改革；奉使考察西方，周遊全球；主持理工科大學，提倡西方科技；唐文治於西學西法的認識和體會，非尋常可比。因此，其提倡“讀經”的殷切，實乃是在通透天下形勢和深切了解世情之下的紓難對策，不能視之為思想落伍的復古守舊。1947年唐文治於上海交通大學五十一周年校慶訓辭，便強調親歷說：

余從前遊歷歐、美各國，考察民風，大都兢兢業業，以保存基本國粹為宗旨。“四書”、“五經”，吾中國之國粹也。蔑棄國粹，人心因而好利，人格因之日墮。於見利趨之若鶩，廉耻斯喪，實由於此；而民命之流離痛苦，遂不忍言矣。^②

唐文治識多見廣，強調西方列強工商百業高度發展，並沒有放棄文化傳統，更不忘保存和繼承。提倡經學，乃重視傳統文化的精粹，不違社會現代化之途，而且更相輔相成。讀經在正人心，經濟在養民命。前者是道統的責任，後者是治統的職志。唐文治

① 商務印書館編《教育雜誌》25期5號《全國專家對於讀經問題的意見》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35年，第5—6頁。

② 《唐文治文選》，第500頁。

關懷百姓痛苦，出自衷腸，切望解脫蒼生所受的茶毒與痛苦，指出統治者鮮廉寡恥，唯利是逐，百姓的福祉尚且不顧，則遑論傳統文化的精髓。這是唐文治極沉重的信念。1945年3月，抗戰尚未結束，唐文治序《茹經堂文集五編》，自表一生學術宗旨說：

余行年五十後，專心講學，惟以“正人心，救民命”為宗旨。^①

唐文治的經學堅守“正人心，救民命”的宗旨。處於民族存亡的時刻，強烈表現於辦學、講學、撰述，用志之堅與毅力之強，高風亮節，人格與學術到了無可挑剔的地步。論唐文治經學，此為第一義；充滿憂患意識的“讀經救國”論是其終生奮鬥的目標。

三、從《十三經讀本》看唐文治的“經學家法”論

唐文治《十三經讀本》序文提出“經學家法”和“經學義理”兩項重要觀念，以“經學”收攏清儒所強調的漢、宋兩大學術氣脈。唐文治一本其時代關懷的真切用心，駕越一切門戶，兼容並蓄，開展氣象恢宏的學術空間。

唐文治自幼力學，目力由此而衰，至1920年56歲壯年之際完全失明。失去學問研究至重要的條件，是一生極大的打擊。但生理的缺憾未能阻遏其治學、講學、傳道的任務，此後惟仗記憶與體會，口授祕書筆錄，敷陳諸經的“大義”，述說朱子與王陽明學術宗旨，未嘗中斷，學術生命力依然極其旺盛，繼續實現正人心的道統關懷。書成之時，適值新文化運動之後，自然被認為刻意針對時代思潮；兼篇幅繁雜，傳習不易，令人望而生畏，在20世紀的學術界未能產生即時的影響，而難以獲得重視。綿綿若存，以至於今。但理解民國經學的進程，《十三經讀本》則不容忽視。

清末阮元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集漢唐注疏，乃研治傳統經學的必備。唐文治適逢其時，亦非常重視，實可不必改作，因循而標榜。假如是遺民式的標榜，抗衡時代的新變，則於所主持的學校硬推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已可以達到保存辦子之姿態作用。其尊經學而不相沿阮刻《十三經注疏》，卻耗用大量心血，以十多年的寶貴歲月，在友人的資金支持下刊刻《十三經讀本》，其中不盡是曖昧抵制的遺民行為，其經世的初衷始終是關鍵。

1921年刻成《十三經讀本》，是唐文治一意於經學以挽救人心、國運，累積了十多年的心血的鉅撰，《〈十三經讀本〉序》表明尊經的用心，皆從救世的憂患意識出發：

^① 《唐文治文選》，第482頁。